

未竟的事业：抗战时期重庆科学馆的筹建

王 涛 刘年凯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重庆科学馆的建设肇始于1941年国民政府拟定的科学馆规程。1944年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的举办直接推动了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以便永久陈列展览会展品。然而，重庆科学馆选址多次变更，建设屡次中断，最终未能建成。对重庆科学馆筹建历史的梳理揭示了战争期间这一科学制度化尝试最终失败的多重原因，包括财政困难与军事优先政策等。重庆科学馆的筹建成为“未竟的事业”，折射出战时中国科学体制建设面临的困境，也为理解特殊历史语境下科学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重庆科学馆 重庆陈列馆 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 中国西部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69.26/N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10(2025)04-0036-07

民国时期，多个省份曾建设和运行“科学馆”。作为科学教育的推广机构，这些科学馆主要针对普通民众和中小学生开展科学普及教育，同时承担着辅助学校科学教育的任务，为学校提供科学实验仪器。目前，关于民国时期科学馆的活动已有一些研究。王伦信论述了从1928年湖北省科学馆动议建设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不断推广科学馆这类公众文化教育设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辅助学校科学教育以及开展科学研究，他还重点阐述了科学馆在民国时期中学理科实验教学中的作用^[1]；索南昂修等进一步探讨了民国时期科学馆“馆校结合”的具体合作机制^[2]；于鑫等梳理了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发展脉络和具体科学活动，归纳其主要特点为组织管理系统较为严格、受教门槛低、影响范围广以及区域性明显^[3]。

关于具体的科学馆也有了初步研究。例如，徐悦蕾等以福建省立科学馆为例，论述了福建省立科学馆的创立、发展和组织机构，及其通过举办科学演讲、发行科学常识手册和放映科普影片等方式发挥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成为当时最成功的科学馆之一。^[4]贵州省立科学馆同样是民国时期较为成功的科学馆代表，于鑫等分析了贵州省立科学馆的筹建过程、组织结构和科普活动，揭示了其在提升民众科学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科学馆的民众科学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讨论。^[5]张煜等则以四川省立科学馆为例，分析了四川省立科学馆为偏远地区民众普及科学知识做出的突出贡献。^[6]

抗战时期，战时首都重庆也曾动议建设科学馆，但与前述科学馆不同，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重

[1] 王伦信：《民国时期的公共科学馆与中学理科实验教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 索南昂修、白欣、吕梦佳：《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早期探索——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为例》，《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7年第6期。

[3] 于鑫、白欣、刘树勇：《民国时期科学馆的科学教育活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期。

[4] 徐悦蕾、白欣：《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立科学馆》，《科普研究》2017年第4期。

[5] 于鑫、白欣、索南昂修：《民国贵州省立科学馆的科普工作》，《科普研究》2017年第2期。

[6] 张煜、于鑫、白欣：《民国时期四川省立科学馆的科学教育活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1年第1期。

庆科学馆最终并未建成。近年来，王涛、刘年凯从经费视角对比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西部博物馆与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与运行：中国西部博物馆于 1943 年底由多个学术单位发起，1944 年底在北碚成立并开放，虽然也曾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但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与支持，最终快速建成且展品不断丰富；而重庆科学馆虽由政府主导，经费预算高，实际未获足够的支持，最终未能建成。^[1]除此之外，重庆科学馆作为个案，目前还少有学者研究，其历史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

本文基于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档案，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重庆科学馆建设的脉络，包括其最初建设的目的、多次选址变化的波折以及取消建设的过程，进而分析重庆科学馆筹建计划破产的原因。以重庆科学馆为个案，探讨其筹建与失败的历史，具有多重研究价值：该案例展现了民国时期科学类博物馆的规划理念与实践过程，其筹建过程反映了战时博物馆建设的特殊性，为理解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新角度；从科学史视角而言，本研究揭示了民国时期科学建制化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凸显了战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一、重庆科学馆的建设起因及正式筹备

（一）1941 年国民政府对科学馆建设的谋划

1941 年 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强调抗战时期应关注民生福利，而各省市的科学馆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制定了科学馆规程，提出科学馆的重要工作是普及自然科学教育与组织科学实验。为避免科学馆组织过于庞大以及节省经费起见，规程暂时将科学馆分为总务、展览与推广三部，且科学馆需要加入科学化运动促进会，负责举办自然科学演讲、科学补习班、科学讲座以及定期展映科学电影。基于此，教育部要求各省至少设立一所科学馆，在人口众多且经费充足的地方可以设置数所。^[2]

同年的《省市立科学馆工作大纲》中，教育部明确指出科学馆的预期目标为普及科学知识和辅助学校科学教育等，以促进科学研究、提高民众文化水准与发展国民生计。此外，科学馆还应担负辅导或协助各社会教育机关及公、私立中小学进行科学教育的责任。科学馆的施教范围应以全省市民众为对象，各种设施尽量巡回利用并进行推广。关于施教方法，应根据民众的实际需要，灌输科学常识、扶助地方生产，并联络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当地学术界人士，以增进工作效能。^[3]该大纲还规定科学馆展览部的工作内容有：（1）分别征集，制备或选购我国有关科学史实，中外科学图画表册，机件仪器，标本，模型器材及科学教育用品，职业用品，科学玩具并展览之；（2）适应时机举办各种中心展览，如国防科学展览；（3）举办科学实验表演或科学示范工作……^[4]然而，重庆社会局发现，重庆市政府在 1941 年核定预算时并未列有设立科学馆的经费，因此计划在 1942 年经费稍微充裕后再行设置。1941 年 5 月 6 日，教育部通过了缓期设立重庆科学馆的决定，通俗科学教育工作暂由市立民众教育馆兼理。^[5]其后近三年，重庆科学馆的筹设一直停滞。

[1] 王涛、刘年凯：《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西部博物馆与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与运行：基于经费的视角》，《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5 年第 1 期。

[2] 《各省市公立科学馆规程、工作大纲、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书》（1941 年 2 月—1948 年 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2。

[3] 《各省市公立科学馆规程、工作大纲、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书》（1941 年 2 月—1948 年 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2。

[4] 《各省市公立科学馆规程、工作大纲、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书》（1941 年 2 月—1948 年 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2。

[5] 《教育部有关筹设重庆市科学馆的文书》（1941 年 12 月—1946 年 11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9。

（二）1944 年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促使重庆科学馆正式筹建

1944 年 1 月 29 日，教育部向各省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强调“科学教育关系建设与国防”，为当务之急，科学馆是实施通俗科学教育的重要机构，因此敦促各省市教育局尽快成立科学馆：“各省市前已遵由设立者，要求充实内容，并监督积极工作。其仍在筹备中，则需于本年度内正式成立，不可再延迟。情形特殊的，也需要立即开始筹备。”^[1] 3 月 2 日，教育部专门向重庆教育局发函，强调科学教育对于国防与民生的重要性，科学馆设立不宜再度延迟，建议重庆教育局在所属性质相近的学校内附设一所科学馆，到 1945 年则必须设立一所独立的科学馆。^[2]

1944 年 2—4 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工矿产品展览会，交通部公路总务司、卫生署及兵工署也举行了各种事业成绩展览，参观者认为展览的展品、图表、模型等可以长期陈列，重庆科学馆是较好的陈列场所。^[3] 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呈给行政院的文件中提及：“前拟收取各种展览品，图表，模型及小部分制成品等于闭幕后集中一处，长期陈列，使得重庆市民及来渝人士对各种资源及国力及国人创业精神有深刻之认识，而引起对国家前途生成无穷之希望与热情，并促进一般青年对科学研究之兴趣。经由机关开会商议进行方式，决定设立重庆科学馆”，同时提到经费“暂定为二千万元，由地方政府筹九百万元，教育部及市政府一百万元，其他捐助两百万，其余七百万，请求中央补助”。^[4]《大公报》报道了重庆科学馆筹备设立的消息，指出其设立目的是让“重庆市民及来渝人士对于政府开发资源及国人创业精神有深刻认识，以增进研究各项科学之兴趣”，报道称贺耀组市长邀集了有关机关首长及各学术团体负责人作初步商议；之后该馆将在大田湾建立，建筑经费暂定为 2000 万元，并先将展品于闭会后集中一处存放，等待场馆建成后迁入长期陈列，以逐渐充实其内容。^[5]

可以说，工矿产品展览会等展览激发了民众对重庆科学馆的向往，为其筹建提供了契机。工矿产品展览会结束不久，1944 年 5 月 18 日，重庆科学馆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重庆市政府中山堂举行。会议报告“委座批‘补助费暂从缓议’，但事关本市民众教育，仍拟继续进行，另筹款交付”，此时工矿产品展览会的展品已移交 58 箱，还有 46 件正准备移交；市政府已经垫付 15 万元，作为保管藏品的费用；陈立夫拟派许心武负责重庆科学馆的设计工作。^[6]

经会议讨论，重庆科学馆在成立之前暂称为“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7]，并请重庆市市长贺耀组担任主任委员。馆址暂定在大田湾，楼房计划占地 440 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约 15000 元，共需 660 万元，连同内部设施等总计需要 1300 万元。关于经费的方案原本是：“建筑费六百万元，设备费七百万，由交通部、经济部、教育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元，其余由地方筹措。”经过讨论，费用分配有了一些变化：“设备费七百万，由地方筹措。建筑费六百万元，由交经二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元，教育部担负一百万元，市政府担负两百万，并由市政府先行垫款开工。”^[8] 人事架构上，除拟定贺耀组为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兆洪等为委员外，还计划设立总干事一人，其下设立设计、建筑、财务、保管与总务组，组下各设立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同时，需要各单位推荐专任干事，

[1]《各省市公立科学馆规程、工作大纲、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书》（1941 年 2 月—1948 年 3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2。

[2]《教育部有关筹设重庆市科学馆的文书》（1941 年 12 月—1946 年 11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9。

[3]《关于卫生署及兵工署举行各种事业成绩展览上行政院的呈》（1944 年 3 月 22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0-00383-0000-022-000。

[4]《关于卫生署及兵工署举行各种事业成绩展览上行政院的呈》（1944 年 3 月 22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0-00383-0000-022-000。

[5] 盟利社：《重庆科学馆各方筹议建立》，《大公报》（重庆版）1944 年 3 月 12 日第 3 版。

[6]《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纪录》（1944 年 6 月），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2-01-047-04。

[7] 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建议之后定为“重庆陈列馆”。

[8]《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纪录》（1944 年 6 月），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2-01-047-04。

并介绍富有学识和具备创办科学馆经验的专家，以便该馆成立时担任馆长或副馆长。^[1]

二、重庆科学馆的筹建和取消

（一）从黄家垭口到较场口

1944年5月重庆科学馆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之后，重庆市工务局的俞大奎和唐文练赴大田湾勘察，发现“该处新建房屋甚多，已无适当面积可资应用”，于是另觅新址。7月，重庆市工务局向重庆市政府报告称，黄家垭口的高岗一段除电丝外，无其他建筑物阻碍，似可利用，并在请示市政府同意后向地政局办理征用土地手续，并提交了地形图以便参考。^[2]

不过，黄家垭口高岗的科学馆建设并未实际进行。1944年10月26日，在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第四组向重庆市政府报送的重庆市科学馆建筑工程意见中已经提到，科学馆的选址改为较场口广场。当时，场馆设计方案已经基本确定。秘书处要求进一步明确预算开支，并提出两点问题：第一，较场口广场下方建有防空大隧道，曾因通气不足发生事故^[3]，政府为此在广场上加设通气洞，而科学馆的建设计划使通气洞被围入内圈空地，因此需要解决通气洞的保护问题；第二，科学馆房屋毗连成圆形分布，按照规定，每隔18米应筑防火墙一道，虽然科学馆的陈列室需要联通，但也需注意防火等安全问题。^[4]对此，重庆市政府在10月31日指示，重庆科学馆并不对通气洞通风产生影响，理由是“其建筑物最里圈至大隧道通气洞边留有近四公尺距离，于通风实无妨碍”，防火部分也已经商洽加装防火墙四道。^[5]

因较场口广场还有一座机枪掩体，重庆科学馆的建设或会影响该设施的使用，对此重庆市工务局专门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发函，告知科学馆已选址较场口广场，承诺将来必要时会拆毁科学馆房屋，对射界不造成妨碍。^[6]1944年11月16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向工务局致函，强调该馆修建的地址位于堡垒所在地带，依照战时法律本不允许修建民房，但“阐扬科学，理应赞助”，因此便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不妨害射界原则下构筑，俾军事文化两不相妨”，要求工务局先把设计图送来审查。^[7]

1944年10月23日，工程开标，重庆市工务局选择由开价最低的森茂建筑公司承包重庆科学馆工程，但该公司直至11月27日仍然未收到预支工程款，致函工务局请求“将预支工程款900万元内先发到600万，其余300万运到材料后陆续付清”^[8]。1945年1月，由于物价上涨远超预期，重庆工务局决定注销开标结果，取消原本与森茂建筑公司订立的合同，由该局第三科科长重新设计办理。^[9]

（二）选址学田湾及与森茂建筑公司合同终止

1945年下半年，科学馆的选址变更为学田湾^[10]，建筑承包商仍是森茂建筑公司，计划在8月15

[1]《教育部有关筹设重庆市科学馆的文书》（1941年12月—1946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9。

[2]《关于在黄家垭口高岗建筑重庆陈列馆上重庆市政府的呈》，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0-00383-0000-070-000。

[3]指1941年6月5日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

[4]《关于报送重庆市科学馆建筑工程意见给重庆市政府》（1944年10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0-00383-0000-106-000。

[5]《关于陈列馆建筑工程应注意事项的指令》（1944年10月3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048.0000-014。

[6]《关于请准予在较场口广场修建陈列馆致重庆卫戍司令部》（1944年10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048.0000-012。

[7]《关于请准予在较场口广场修建陈列馆致重庆卫戍司令部》（1944年10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048.0000-012。

[8]《森茂建筑公司关于请发给建筑重庆科学陈列馆工程工程款》（1944年11月2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42.0000-003。

[9]《关于重庆设计办理重庆科学陈列馆建筑工程的指示》（1945年1月19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053-000。

[10]由于史料缺失，此次选址变化原因仍不能确定。

日开工,所需工款开支预计为1222万元。^[1]森茂建筑公司8月20日向工务局第三科呈文,提及8月17日已领到预借工款,不过因建筑范围内有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汽车房一幢以及篮球架、电线杆等障碍物,若不先将障碍物拆除则建设工程无法进行,因此将障碍物拆除后的第2天作为开工日期。^[2]然而,形势很快再次发生变化。1945年10月,防空司令部决定把该部未完成的房屋改造为重庆陈列馆,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将其交于中美建筑公司,承包价为275万元。^[3]这可能是因为抗日战争结束后,防空司令部不再需要尚在建设中的房屋,因此与重庆市政府协商改作陈列馆。

重庆工务局在1945年9月8日即通知森茂建筑公司停止工作,学田湾的科学陈列馆工程终止,工务局派人验收,统计已经产生的费用为350万元左右。^[4]根据森茂建筑公司10月22日向重庆市工务局呈送的公文可以得知,双方就实际发生的费用问题存在较大分歧。10月16日,“第一科陈代科长面告该案总数已决,唯三百四十九万元,与本公司表列综述四百二十八万元,相差七十九万元之巨,工程已停,血本复亏”,森茂建筑公司经理蔡复祖专门向重庆工务局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说明具体费用情况,包括工地材料、招雇员工薪膳费及遣散费、木工石工的招工费、担保人的招待费以及交通开支。例如,由于工程合同对时间要求极为严格(8月15日开工,60个工作日内完成,延期一天罚款10万元),需要招揽大量工人迅速到位,因此分别提前支付木工头、石工头招工费12万元和6万元,计划取消后资金难以收回,等等。总之,森茂建筑公司提供了开工至停工期间产生的费用情况,强调该工程不仅无法盈利,反而亏损严重,要求工务局如数补偿损失。^[5]不过,我们并不清楚双方最终是否达成共识。

之后,重庆市工务局把剩余的建筑材料“登报标售”,但无人购买。^[6]1946年2月,重庆市警察局准备建设公共厕所,重庆市工务局转而咨询警察局能否接收剩余的建筑材料。^[7]该请求遭到警察局拒绝,提出各承包商均认为其距离较远,而时间紧迫,不愿购买。^[8]其后部分建筑材料因为存放太久,逐渐损坏或丢失。根据重庆市工务局1946年11月14日向重庆市政府的呈文可知,部分剩余材料如砖瓦等被用于重庆新市区的道路建设与抢修。^[9]

(三)中美建筑公司的改建后续

中美建筑公司于1945年10月后着手将防空司令部的房屋改建为科学馆,但“中途屡因物价波动,

[1]《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关于验收学田湾科学陈列馆建筑等情的函》(1946年7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173-000。

[2]《关于依照合同规定建筑科学陈列馆房屋上重庆市工务局第三科的呈》(1945年8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070.0000-013。

[3]《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关于验收学田湾科学陈列馆建筑等情的函》(1946年7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173-000。

[4]《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关于验收学田湾科学陈列馆建筑等情的函》(1946年7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173-000;《重庆市工务局关于报送停止学田湾科学陈列馆工程及办理情形上重庆市政府的呈》(1945年10月2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47.0000-012。

[5]《森茂建筑公司关于请求发给科学陈列馆垫款及押标金,派员接管材料上重庆市工务局的呈》(1945年10月2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47.0000-014。

[6]《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关于验收学田湾科学陈列馆建筑等情的函》(1946年7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173-000。

[7]《关于请求转求警察局接受科学陈列馆材料上重庆市政府的呈》(1946年2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05.0000-002。

[8]《重庆市警察局关于告知不予接收科学陈列馆剩余材料致重庆市工务局的函》(1946年3月3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05.0000-010。

[9]《重庆市工务局关于科学馆备料已移用一部分等情上市政府的呈》(1946年11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185-000。

包商无力继续完工”^[1]。1946年7月，重庆市政府秘书处派人接收学田湾的科学陈列馆，发现其建筑质量堪忧，“建筑材料脆弱，楼层不能放置重物”，且建筑存在许多不完善的部分，如“各层窗门缺乏玻璃装置，左上角木棉瓦损坏一张，楼上泥土粉刷云板脱落”，无法实现科学馆最初计划的功能。但是，不予接收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月，重庆市政府秘书处认为“若任其搁置，势必已修部分也将逐渐损坏，由于该项建筑情形特殊，由本府五组先行派员接管，再行督促承包商限期完成，否则即吊销执照”，所以先办理了代管手续，等中美建筑公司工程续建结束后再补办验收报销手续。^[2]因史料缺失，不清楚后续进展如何。

重庆教育局也非常清楚科学馆建设的困难。1946年10月，重庆教育局呈报教育部称“本市科学馆早已着手筹备，因限于经费迄今未完成，1947年度经费又经市政府剔除，实无法进行，待经费有着，自当积极筹备”^[3]。

（四）展品的处理

1944年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结束后，展品如何保管一直让重庆市政府颇感难办。这些展品原本计划先由重庆市政府保管库继续保管，同时向中国西部科学馆或者西南实业大厦商洽分存解决。^[4]展品价格昂贵，对于科普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展品种类繁多，且展览会工作人员已经返回，到1945年底，展品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保管，或由于“贮存库房下为泥地，上盖竹席”等环境问题导致金属霉烂，或因多次运输颠簸而破损。^[5]

在此期间，重庆市工务局工程师曾建议成立“科学馆展览品整理保管委员会”，由市政府主持聘请有关部门（如经济部与北碚陈列馆等）人员共同商讨，找到整理办法并明确职责。然而，由于战时人手不足和经费短缺等原因，该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此后几年展品始终缺乏专人清点与管理。^[6]1947年11月，重庆市政府致函北碚管理局，希望把工矿产品展览会的展品移交位于北碚的中国西部博物馆，认为“是项展品为抗战时期全国工业矿业及科学之成绩表现，深具重大价值。本府以其有关民间科学知识之宣扬，自可遗赠贵局中国西部博物馆加工修理陈列，以增地方文化”^[7]，并请北碚管理局派人来办理接收手续。随着重庆市政府主动将展品移赠中国西部博物馆，重庆科学馆的建设计划基本宣告破产。

结 语

本研究梳理了重庆科学馆筹建的主要节点，并尝试探讨其筹建失败的原因。重庆科学馆的建设源于战时教育部对科学馆普及科学文化教育的需求，而1944年的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则提供了建设科学馆的契机，推动筹备程序迅速启动。但由于战时财政困难、选址变更频繁、建筑合同纠纷和物价剧烈波动等原因，尽管多方努力推动，但直至战后仍未建成可供使用的科学馆空间，原计划入藏科学

[1]《重庆市政府关于验收科学陈列馆工程结算及验收证明书致审计部的公函》（1947年10月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1-00032-0300-501-000。

[2]《关于移交科学陈列馆房屋的呈》（1946年7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1619-0000-477-000。

[3]《教育部有关筹设重庆市科学馆的文书》（1941年12月—1946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9。

[4]《蒋廷璧关于重庆市科学馆保管库工作人员继续负责保管资源委员会工矿展览品上重庆市政府的呈》（1945年5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20-00383-0000-210-000。

[5]《资源委员会各单位产品展览陈列情形（一）》（1945年12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3-010301-0719。

[6]《重庆市工务局关于报送整理科学陈列馆展览品模型情形的呈》（1945年12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7-0005-00147.0000-021。

[7]重庆市档案局（馆）编，唐润明主编：《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96-4697页。

馆的展品亦因保管失当而逐渐损毁，最终由重庆市政府移赠中国西部博物馆，重庆科学馆建设计划破产，成为“未竟的事业”。

通过梳理重庆科学馆在 20 世纪 40 年代筹建、停工、改建乃至展品流转的过程，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在推动科学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优先保障战争需求，导致重庆科学馆这一非紧急项目因资金短缺而搁置。可以说，重庆科学馆的筹建是战时中国科学事业的一次重要尝试，反映了战时科学事业在资源匮乏和社会动荡情景下的发展困境，深刻呈现了科学事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马 源）

Unfinished Endeavor: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ng Tao Liu Niankai

Abstract: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began in 1941,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mulated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Science Museum. The 1944 Chongqing Industrial and Mining Products Exhibition directly pushed forward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in order to provide a permanent display for the exhibits. However, the site selection was changed multiple times, and the construction was repeatedly hindered, ultimately failing to be completed as scheduled.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ultiple reasons behind the failure of attempts to institutionalize science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includ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prioritization of military needs.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of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establishing China's scientific system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within a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Chongqing Exhibition Hall, Chongqing Industrial and Mining Products Exhibition, Western China Museum